

## 关于《物竞论》

李冬木

### 一、前言

笔者在思考鲁迅(1881—1936)留学时期思想的形成,特别是鲁迅的进化论的时候,遇到了《物竞论》问题。这里的问题包括,鲁迅是怎样“读懂”进化论,即鲁迅是怎样接受进化论的?除了众所周知的严复(1853—1921)的《天演论》(1898)以外,他还读了哪些进化论或者与进化论有关的书?同时,又受到了同时代氛围的怎样的影响?进化论方面的其他书籍以及时代氛围,在鲁迅那里和《天演论》又构成怎样的关系?有怎样的相互作用?它们在鲁迅文本当中又有怎样的体现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逐一调查,分析和认证,也需要逐一撰文把它们整理出来;而即使在这篇小论当中,也因篇幅所限,不能具体展开鲁迅与《物竞论》关系的论证。因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是需要首先把《物竞论》这本书以及相关的情况调查清楚的。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物竞论》的内容本身,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物竞论》与时代,特别是与《天演论》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的影晌。

### 二、《物竞论》及其研究

《物竞论》系加藤弘之(Kato Hiroyuki 1836—1916)著《强者的权利竞争》(《强者ノ權利ノ競争》,日本哲学書院,1893.11.29,日本語版)<sup>(1)</sup>一书的中译本,译者杨荫杭(1878—1945),最初连载在《译书汇编》1901年第四期、第五期、第八期上。本稿所使用的蓝本,即是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译书汇编》中的这三期的连载。它们的封面字样分别为:

(一)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三日发行 译书汇编 再版第四期。(二)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三日发行 译书汇编 第五期。(三)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明治三十四年八月廿八日发行 译书汇编 第八期。

“光绪”和“明治”年号后的发行月日的不同乃农历和公历的区别,但这些封面的发行日期与封三所载的发行日期并不相符,封三日期分别标为“明治三十四年五月廿七日发行”、“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行”和“明治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发行”。“第四期”前面有“再版”的字样,其再版日期为“明

治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全书由总论、第一至第十章和结论构成，在《译书汇编》上连载的内容分布是一一第四期：总论、“第一章 天赋之权利”、“第二章 强者之权利”、

“第三章 论强权与自由权同并实权相关之理”、“第四章 论人类界强权之竞争”、“第五章 治人者与被治者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物竞论》统排页码为1—46页。

一一第五期：“第六章 承前”、“第七章 贵族与平民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第八章 自由民与不自由民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第九章 男女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统排页码为47—98页。

一一第八期：“第十章 国与国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结论”，统排页码为99—120页。”除此之外，还有《物竞论目录》和后署“译者自志”的《凡例》。

本文以下引用《物竞论》本文，其各章标题和页码，均出自上述排列，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另外加注。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所及，最早提到《物竞论》与鲁迅的关系问题的，是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1985），该书曾经指出过：“据周作人的日记记载，鲁迅在赴日前曾买过加藤弘之的《物竞论》”，并且认为包括《物竞论》在内，“日本的有关进化论的著述，曾经是中国人认识进化论的一个渠道。对鲁迅来说，也是这样。”<sup>(2)</sup>笔者在调查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一书与鲁迅的关系时，也检阅并且涉及到了周作人日记中关于《物竞论》的记载。<sup>(3)</sup>

邹振环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也以《〈物竞论〉的译本与原作》为题把该书列为其中之一予以介绍。<sup>(4)</sup>其主要工作有三：（一）纠正了《鲁迅与日本文学》当中的一个误认，即《物竞论》的原作并非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而是它的另一部著作《强者的权利竞争》。（二）调查了《物竞论》在《译书汇编》上连载和以后的单行本的发行情况，从而弥补了前人调查之不足。<sup>(5)</sup>（三）介绍了《物竞论》译刊后，“颇受当时学人的重视”的反响。

此外，实藤惠秀的《增補 中國人 日本留學史》的第五章《留日學生ノ翻譯活動》和第六章《中國出版界ヘノ貢獻》，对翻译出版《物竞论》的《译书汇编》社的情况也有着详细的记载，可以用来参考。<sup>(6)</sup>

关于译者杨荫杭，现在知道，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1899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并在1900年和杨廷栋、雷奋等人共同创办了《译书汇编》社，从事翻译活动。其比较详细的情况，可参见杨绛的《回忆我的父亲》。这篇回忆录最初分别连载在《当代》1983年第5、

6期上，后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回忆两篇》中，1994年1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杨绛散文》中亦收该篇，有“前言”称根据1983年发表后各方人士陆续提供的资料，“已把原文相应修改”。此外还有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上的邹振环《辛亥前杨荫杭著译活动述略》。

现在知道《物竞论》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但根据已有的资料可知道，这本书在当时是继《天演论》之后的又一本具有重大影响的译著。那么，《物竞论》和《天演论》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在进入《物竞论》之前应该先解决的一个问题。

### 三、《物竞论》与《天演论》

众所周知，托马斯·H·赫胥黎的(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是1894年出版的，严译《天演论》分别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和天津嗜奇精舍(石印)正式出版是1898年。就是说，原著的出版时间，虽然是《强者的权利竞争》在前，《进化与伦理》在后，但它们的中译本的出版时间却正好是相反的。这不仅表明中国读者接受它们的时间顺序不同，也暗示了它们的某种更为广泛的而深刻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天演论》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所直接刺激出来的危机意识的产物<sup>(7)</sup>，那么《物竞论》的出现，就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个具有复合性质的历史的派生物。首先，甲午战败后，清国不仅有了《天演论》，也于1896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去学习打败了自己的日本，这样就使得实藤惠秀所说的大规模的“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成为可能，只要看一下著名的《译书汇编》社成员名单，<sup>(8)</sup>就会知道，包括《物竞论》的译者杨荫杭在内，全体成员几乎都是当时在东京各校就读留学生。其次，这些留学生不仅和严复翻译《天演论》时一样，念念不忘甲午的刺痛，而且也后来的周氏兄弟一样，在去日本以前就读过了《天演论》并且深深地受到了《天演论》的启蒙熏染，这在《物竞论》的译文当中可以找到很明显的例证。例如，在《第十章 国与国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中有这样一段话：

凡欧人日求利己，而野蛮各国之受其害者，不一而足。此固徵之历史而显且著明，为人人所共知者。虽然，此不独野蛮之民而已，即半开之民亦有之。今日英法两国，奋其权力诈谋，以夺取缅甸、安南，及法国之于暹罗，即其例也。又数年前，英国以阿福汗之事，与俄国起衅，乃遽以兵力占据朝鲜之巨文岛。当其时，英与朝鲜为和好之国，若英之所为，盖亦背条约者也。

译者就此做注释道：“按此书成于明治二十六年，犹在甲午以前，故甲午以来时事，概未论及。”（第106页）此书与甲午战争本来并无直接关系，但经译者的这样一“按”，也就自然会令人联想到甲午战争也就是原作中所述的强国“求利”，弱国“受其害”的世界现实的延长，译者翻译此书时的不忘甲午之念，也就犹然可见了。此外，严复的影响在这个译本中也很明显。书名《物竞论》并非加藤弘之的原书名，译者在《凡例》中对此有一个说明：“是书原名曰《强者之权利之竞争》，词大拖沓，后改为改曰《强权论》，或谓不如《物竞论》之雅，卒改今名。”但取做书名的“物竞”二字，却是严复《天演论》里对“生存竞争”一词的翻译。尽管正像后面将要探讨的那样，译者并没有采用严复“雅”译的概念系统来翻译《物竞论》，但表述“自然进化”之意的地方还是一律译作“天演”。如“由于吾人之祖若宗居于天演界中，日与他物相竞争”（第1页），“凡有生之物，皆由天演而来。天演者……”（第13页），“凡强者之权利，皆由天演而得，盖出于自然之权力”（第24页）之类。这里出现的“天演”一词，在原作里都表述为“遺傳と應化”<sup>(9)</sup>。因此可以断定，译者本人在阅读顺序上是先读《天演论》受其影响而后才选择《物竞论》来翻译的，这个阅读顺序也刚好和鲁迅的阅读顺序相一致。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使人意识到《物竞论》很可能正好处在一个把《天演论》的读者进一步朝着某个方向上导读的位置。

这个方向是什么呢？这就是《天演论》和《物竞论》关系的第三点，即日益加深的现实危机把人们的意识由主要还是在讲述“自然与人”的《天演论》的框架中更进一步推向了单一的旨在讲述人类社会的“强者的权力即权利”的《物竞论》的框架里。继《天演论》之后的《物竞论》之所以能够一版再版，获得人们的共鸣，就在于国将不国的被瓜分的危机日益迫近的缘故。继甲午一败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之后，列强蜂拥而来，就在《天演论》正式出版的1898年，德国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旅顺、大连；法国占领了广州湾并且在福建、云南、广西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租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而旨在挽救危机的戊戌变法也遭到了镇压；到了1901年3月因义和团事件而签订《辛丑条约》时，清国已无力对列强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这种危机感表述为鲁迅1903年的文字就是“血眼欲裂”（列强）和“绝种Extract species”（中国）这两个词<sup>(10)</sup>。人们眼前的这一岌岌可危的现实世界需要提供一种“合理”的，也可以叫做“符合逻辑”的解释，而《物竞论》又恰恰满足了这种要求。那么《物竞论》的内容怎样？它是怎样注释人们眼前的这个现实世界的呢？

#### 四、加藤弘之及其原著

前面提到,《物竞论》的原本是加藤弘之的《强者ノ權利ノ競争》,这本著作的日文版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由东京的“哲学书院”公开发行,菊判244页。但本文这次参照的不是这个版本,而是日本评论社昭和十七年(1942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田畑忍的“解题”版,是该出版社当时出版的六种“明治文化丛书”之一<sup>(11)</sup>。不过据《后记》介绍,除了两三处“用字”的技术处理外,原原本本地忠实再现了明治第一版。<sup>(12)</sup>也就是说,这个版本和杨荫杭所用底本可以看做是一致的(在以下的注释中记为“田畑忍解题版”)。

关于原作者加藤弘之,现在除了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要涉及到他以外,即使在日本也几乎很少为一般所知,这一点恰恰和福泽谕吉(Fuzawa Yukichi, 1834-1901)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现在通行的两种百科全书,即小学馆的《日本大百科全书》(1996)和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1998)对加藤弘之的介绍,内容差不多,但都很简单,这里只以《日本大百科全书》为例:

加藤弘之(Kato Hiroyuki 1836-1916) 明治时代的国法学者。天保7年6月23日出生在但马国(兵库县)出石藩的兵学师范之家。为继承作为其家学的甲州流军学,就学于藩校弘道馆之后又去了江户。因不满足于传统的兵学而投入佐久间象山之门下,转学西学。1860年(万延元年)担任藩书调所的助教,在那里认识到西洋文明的本质并不在于“武备”,而在于“政体”,于是转向政治学。1861年(文久元年)做《邻草》,最早向我国介绍了立宪思想,主张有必要建立议会制度。明治维新以后仍致力于介绍立宪制,写作了《真政大意》(1870年)和《国体新论》(1875年)等书,同时还加入明六社,继续开展启蒙活动。

1877年(明治十年)任新设的东京大学“总理”(即校长——笔者注),从那时起开始倾向进化论,在《人权新说》(1882)中,以进化论的立场批判了天赋人权说,在当时被责难为“转向”,于是便发生了与自由民权派的论争。此后在历任元老院议官、贵族院议员、枢密顾问官和帝国学士院院长等职务的同时,还以个人身分创办发行了杂志《天则》,继续尝试从进化论的立场来寻找国家的根据。《强者的权利竞争》(1893)和《道德法律进化之理》(1900)等便是这方面的成果。

其最终立场体现在《自然与伦理》(1912)一书中,那就是国家有机体说,即认为“忠君爱国”是“我们每个组成国家的人这一细胞的固有性”,为他一贯支持的明治政府提供了哲学基础。<sup>(13)</sup>

这个简明的介绍，可以说没有什么地方不妥，如果说还需要做一些补充的话，那就是加藤弘之的以进化论为根据的国家思想，或者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与西方思想的同步性。以笔者之浅见，加藤弘之的这一特点在《强者的权利竞争》一书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他完全是在（或者说是按照）西方学者提供的现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内，来和西方学者就历史、特别是现实世界中的“权利”问题进行讨论，并且进行实证性的对照和理论筛选。在那些大量的理论对话当中，与其说能看到加藤弘之的理论建树，倒不如说更能看到西方的理论和行为教给了加藤弘之什么，以及加藤弘之在他所确认的所谓“天则”中为近代日本选择了怎样的生存道路。加藤弘之彻底摈斥了“天赋人权”和基督教的“平等博爱”，而把争取“强者权利”的道路作为唯一的选择，这一结果，便成了他在日本国内和自由民权派进行论战的理论基础。与西方理论的对话、判断、选择和面向国内的生存选择的诉求并存一体，也许既是加藤弘之的最大特色，同时也是《强者的权利竞争》一书的最大特色。据田畑忍介绍，早在日文版公开发行半年以前，即明治二十六年（1893）五月，出自加藤本人之手的德文版（东京）已经以“非卖品”的形式发行，第二年又在德国出版了柏林版；德文版当中的引文均有注释和说明，而在日文版中，这些注释和说明却都被取消了。<sup>（14）</sup>撇开内容不论，笔者以为，仅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在目的上的两重性，即与西方的“对话”，倾向学理上的探讨和观点的选择；而面向日本国内却成为关于“权利”问题的宣言和主张。

## 五、中译本中的人名与原作《序论》

那么，加藤究竟同西方的哪些人展开了对话呢？这当然是加藤弘之研究领域的专门问题，并非本文的问题和篇幅所能容纳，但由于关系到中文版《物竞论》，也就至少不能不对一些基本情况有所涉及。不过这里还是要先来说一句杨荫杭的翻译情况。

粗粗地对照了一遍中日两种文本，觉得杨荫杭译得还是很老实的，除了一些词语和句子的译法还可以商榷外（如《物竞论》第67页出现的“均产党”，在原文中即为现在通用的“共产党”<sup>（15）</sup>等），应该说是忠实于原著的翻译。这一点和严复的“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的所谓“达旨”<sup>（16）</sup>的译法是大不相同的，或许听从了严复的“学我者病”的忠告也说不定。

邹振环在上面提到的《〈物竞论〉的译本与原作》中引介了译者杨荫杭在

《凡例》里的一段话，并对其中出现的人名做了相应的注释：

他〔指译者——笔者〕在该译本凡例中指出，《物竞论》作者是“日本维新以来讲究德学者之山斗，故是书所论〔以？〕德国有名史学家海尔威尔（今译海克尔，1834—1919）之说为主〔，？〕而〔其？〕外，当世硕学如葛姆（疑为达尔文，1809—1882）、泼老（疑为穆勒1806—1873）伊〔耶？〕陵（今译耶林，1818—1892）、失弗勒（今译谢弗勒尔，1786—1889）、斯宾率尔（今译斯宾塞，1820—1903）之说亦取焉”。<sup>〔17〕</sup>

〔 〕中的文字皆为笔者所加，有的疑为脱字，有的疑为标点断句不当，总之或许因为邹氏所见版本与笔者所见版本不同也未可知。这些可以不去管它，还是先来看一下关于人名的注释。首先“海尔威尔”能否断定为“海克尔”便是问题，因为查原著的《序论》和本文，皆用日文平假名标做“へるわるど”，其读音为“Heruwarudo”，和“Haeckel”（海克尔）的发音并不一样的；尤其在《序论》中加藤介绍该人为“德国著名之史学家”，《开化史》的作者，“强者权利之主义多取自”该书等，<sup>〔18〕</sup>这就有理由怀疑这个作《开化史》的“德国著名之史学家”可能并非德国动物学者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 1834—1919）。待考。其次，两处分别注释“疑为”的“葛姆”和“泼老”，显然是断句之误，这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在加藤弘之的原文里做“ぐむぶろゐつつ”，日文读音为“Gumupuroittsu”，从读音和内容上，马上就可以判明这个人是奥地利的社会学者、政治学者Ludwig Gumplowicz（1838—1909）——虽然还没有查到中文今译为哪几个字。

关于“伊耶陵”（原文ゑいりんぐ，日音Eyiringu，欧文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德国法学家）和“斯宾率尔”（原文すべんせる，日音Shipenseru，欧文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思想家），邹文的注释可能是对的，但关于“失弗勒”的注释可能又有问题，原文为ええふれ，日音Shefure，发音上虽和今译“谢弗勒尔”相通，但也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以笔者之见，倒更可能是当时作为社会学者、财政学者和经济学者在德国很活跃的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Schaffle（1831—1903），因为这个人在社会学领域的立场，是以生物有机体说来分析社会现象，与加藤弘之的主张相一致的。待考。

然而，问题还远不是仅仅如此。加藤弘之在原著中或援引，或驳难，涉及的西方学者达七十多人，这些在日文文本中只用平假名标音而未加任何注释的人名，经过杨荫杭之手译成中文时，又被随意改填成汉字，这就不仅给现在，恐怕在译名并不统一的当时，就已经给判读带来了极大的障碍。笔者以为，近代西方学说进入中国的不彻底，和译名的不统一以及带来的混乱有很大

关系,《物竞论》不过再次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罢了。总之,核对清楚《物竞论》当中出现的人名,将是一项困难而又非常重要的调查,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他们与加藤弘之的关系,也涉及到他们与中国近代的关系。笔者当然会不耻力薄地做一些,同时亦希望能就教于各方的有识者,不过在这篇小论当中,却只能把这些人名暂时附列于各章内容的归纳之后。

这里,还要接着来谈一下中文版中没有的《序论》。其实,上面看到的译者杨荫杭在《凡例》里的那段话,基本来自原作者为日文版所写的《序论》,只是杨荫杭没有翻译这篇《序论》而已。今年(2001年)刚好是《物竞论》出版100周年,把这篇不太长的《序论》试译出来,也不失为一个纪念。其中的人名由于尚没最后确认,姑取杨译人名。

自性法学开创以来,以为吾人之权利出自天赋之主义大行其道,遂至于在法国大革命之际将这种主义明确记录到宪法。近来之学者虽渐悟其非,然而还有不少人对之笃信不疑。还有很多学者,即使并不相信此天赋主义,但仍认为吾人之权利独具公正善良之性质,在其根源和性质上完全不同。

余对此两种主义皆以为非,并且相信,凡吾人之权利,其根源均来自权力(强者之权力)。盖权力行诸吾人社会,获胜之权力必为寡败之权力所认可,故获胜之权力遂由此而得以演变为制度上当然之权利。吾人之权利即获得认可之权利,而并非其他。故凡权利,在吾人看来虽有公正善良与邪恶之分,但於权利本身,却绝无所区别也。

余著此书,即出于详明前述理由之意。强者权利之主义多取自德国著名史学家海尔威尔氏《开化史》之论述,亦有不少乃取自葛姆泼老、伊耶陵、失弗勒及斯宾塞等其他诸硕学之说。而余在此著述中,力排空漠之理论,专引证于吾人社会发达之事迹而论辩之,故余欲自称此书为属于社会的法理学之作。

此前不久既以德文刊行于世,今又以邦文公之于众,如蒙读者批评,将不胜荣幸。

本文中虽就道德、法律或利己心、利他心之旨意多有所论及,然本书原非以论述此等问题为主眼,故或因过于简约,恐有难解之处。近日欲更著小册子,将以道德与法律为题,以明了上述旨意,乞读者谅之。

明治二十六年十一月 文学博士 加藤弘之 著<sup>(19)</sup>

从这篇《序论》中,除了可以了解到加藤弘之的部分思想来源以外,还可以进一步明确,这本书的着眼点并不是自然界的进化和权利问题,而是人类社会



会的权利问题，加藤弘之自己希望把这本书看做讲述法理学的社会学著作的道理也在于此。这一点同《天演论》的一半谈自然界，一半讲社会伦理的内容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

下面将按照笔者自己的理解和问题范围来对《物竞论》的内容做一个归纳。

## 六、强者的权利即权力

就内容而言，《序论》开宗明义，把全书的观点说得再明确不过了。这是继《人权新说》之后，再次向“天赋人权说”的发难之作，而且论点也更为集中和清晰，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强者权利即权力”。全书的内容完全是按照这一观点展开的。其中的《总论》和第一、二、三、四章为理论问题，亦不妨都看作“总论”；第五、六、七、八、九、十章为“分论”，即在“治人者与被治者”、“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不自由民”、“男与女”、“国与国”的关系当中具体展开总论中所阐述的“强者强权之竞争”的问题。

进化论是加藤弘之法理学的基础，因此《总论》（第1—7页）是从“天演界”中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竞争讲起的。人类靠着“能言语”，“能步立”的“区区之所长”而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独胜”，“傲然自称曰万物之灵”，但人类也和万物一样，并没超越宇宙“天则所管辖”，和其他动物相比，不过是“更能考求所谓天则，以利用万物”而已。在“天则”当中就包含着趋利避害，“唯利之是谋”的生物本性；由于人类比任何猛兽都更具有这一本性，所以能够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大获全胜。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奥斯特来特”所说，“日求利己，实有益于进化”。

到此为止，生物进化论的部分就结束了，以下便完全转向了“人类界之生存竞争”，并且旁征博引，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生存竞争的合法性。其道德标准是以是否有利于竞争来衡量的：“彼仁人君子，辄以损己利人为修身之要务，然亦归于空言而已。盖即若辈亦不知不觉，驰驱于竞争场中，以谋一己之利益。此一定之天则，即仁人君子亦不能出其范围也。”（第5页）

而在各种激烈的竞争当中，最大的竞争“莫如权力之竞争”。由此便进入了全书的主题：

所谓权力之竞争，凡强者之权利，必获全胜，固无待言。但强者之权利，即不外乎权力。所谓权力之竞争，所谓强者权利之竞争，其义一也。何则？强者之权利必足以制胜于强者权利之竞争。盖谋生存而欲竞争，由竞争而获生存者，其力皆足以制其竞争者也。

凡吾人之权利自由，皆由于强者权利之竞争而进步者也。欧洲各国人民之权利自由，至近日大为进步，盖强者之权利竞争，实使之然。彼法理

学者，辄曰权利自由，借由天赋，诚谬论也。权力之竞争，即强者权利之竞争，固无待言，且权力者，即以一身言之，固随世运之进步以为进步，然决非公理公义所使然，皆强者之权利所使然也。（第6—7页）

★《总论》中引述的人名有，太洛尔、皮赛、奥斯来特、配鲁太、失弗勒、海沦罢、耶氏。

第一章被译成了《天竞之权力》（第7—13页），但原文是《天赋人权》，顾名思义，这一章是专门用来驳斥自从路索（卢梭）开始的“天赋人权”说的，认为既然人类社会存在着强弱优劣，贫富贵贱，天赋人权便不过是“空谈”和“泡影”，万物界和人类的法定权利，“不过强者之权利而已”。

该章讨论的“权利”问题很多，如包括国家权利、废除死刑、贫民救助等在内的生存权，以及人类平等不可侵犯的权利、行为及交际自由的权利、各守宗旨不受妨碍的权利、自由言论自由思想的权利、谋生自由的权利等等，加藤否定道，它们“断非出于天授”，而皆“人为之权利”。理由是“人类与动物绝无权利之等差”，为何人类可以剥夺动物的权利？结果，亦不过是因为人类拥有强者的权利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加藤强调了即使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也有文明野蛮之别，现在所说的天赋人权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在竞争中成为强者的欧洲人种的权利。

★第一章中引述的人名有，路索、海尔威尔、师丕翕、拉恩罢、伯伦知理、加尔奈理、拉因、师脱老司、皮赛、奥夫内耳。

第二章《强者之权利》（第13—21页），主要论述的是“强者之权利”产生的必然性和绝对性。既然自然界的天则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那么人类获胜，其权利也就当然是“强者之权利”。同样，这一道理也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既然有竞争，就有强弱优劣之别，所谓“权利”就是强者的权利，即强者优者制人，弱者劣者受制于人的权利。

★这一章绝大部分是对西方学者观点的引用，出现的名字有，百鲁脱而、圣葛意得、失来尔、师秘诺萨、伯伦知理、葛姆泼老、黑勒尔、林弗尔持、失弗勒、拉因、伊耶陵、朴师得、海尔威尔、斯拖勒克、皮赛、孚夫内尔、斯宾率尔等，其中，用加藤弘之的话说，“以海尔威尔和葛姆泼老为最”，“以本于两人者为多”；因此，加藤弘之本人的观点并不多，不过是“间亦窃附己意”而已（第19页）。他唯一强调的是，权利虽然在野蛮国和文明国有表现形式的区别，即“强暴”和“高尚”，但本质上和存在的绝对性上并没有什么不

同。

第三章《论强权与自由权同并与实权相关之理》（第21—31页），主要论证所谓“自由权”与“实权”（原文为“眞誠ノ〔法定ノ〕權利”）以及“权力”、“权势”等，实际都是“强者之权利”，虽然说法不同，“其意本属于相同”。其观点来自（一）“堪德及海格尔以君主之专制权、贵族之特权及人民之自由权，皆统而名之曰自由权。其言曰，吾人之自由，因文明之进步，乃渐由少数之手而移于多数之手。盖古者不过君主一人有自由权，後世不过贵族数人有自由权，及近世则凡为人民者，皆有自由权。”（二）“里勃尔曰，凡行为之自由，不独吾人，即动物亦何尝不欲自由？故喜专制之君主，与倡自由之人民，皆欲自由者也。特其所异者，一则所欲者出於私，一则所欲者出于公。故其求自由则同，而其所以求自由之心则不同。”（第22页）

实际上，加藤弘之自己说得很明白：“凡强者之权利，皆由天演而得，盖出于自然之权力。”即把“强者之权利”归结为在生存竞争的力量对比中自然形成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加藤弘之逐一反驳了伯伦知理、路索、法兰兹、馥勒勃尔、斯咄格尔、伊耶陵等人的把权利的产生看作“公正”“善良”的结果，以“权利”和“权力”为不同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加藤弘之认为，即使在这种绝对的自然权力当中，现实中的权利也是可以靠实力来争取的。“故以余观之，一人则占有强者之权利，一人则欲压其权利，然压之无可压，遂不得已而认之实有之权利。苟权利不由此生，皆有名无实也。”（第25页）即权利是力量的产物。

★第三章引述的人名有，堪德、海格尔、里勃尔、伯伦知理、路索、法兰兹、馥勒勃尔、斯咄格尔、伊耶陵。

第四章《论人类界强权之竞争》（第32—37页）概括了前四章的内容，提出在人类社会的竞争中，强弱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权利的分配也是可以改变的。他认为，欧洲各国权利的平均，就是因为“互相冲突，互相平均，而互相认许”的产物（第35页）。

加藤强调欧洲人种的“敢为进取”在权利竞争中的作用。他认为，因欧洲人在“固有之性质”和“承受之性质”上，“优于他人种”，“故强者权利之进步，与万般进化之事同，而远出他种之上。”而“懦弱退缩甘愿压制之人种”，不具备抵抗强权之力，致使强暴之权力可以多行不义。（第37页）

至此总论结束，转向分论，即提出了人类中之五大竞争：治人者与被治者、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不自由民、男与女、国与国之强权竞争。加藤把它

们归类为，“自一至四为一群之内之竞争，其五为群与群之竞争”。

★第四章引述的人名有，葛姆泼老、葛雷牟、罗吉斯

## 七、强权竞争有利于进步

在第五到第十章的关于各种权利关系的分论中，整体理论前提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各种权利竞争以及重新分配的结果，其反复阐述的道理，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吾人之权利，每出于人之认我以权利，而有不得不认之势。所谓强者之权利也。盖他人惠我以权利，固亦易易。然一己之权利，苟不足以享有权利，则所得之权利亦有名无实，无所用之。此强者之权利之所以可贵也”。（第119页）。这个观点可以概括为权利是争来的，不是被赐予的。

第五章《治人者与统治者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第37-46页）和第六章《承前》（第46-57页）主要是谈君权与民权问题，讲到了亚细亚君权的偏重和欧洲的君权与民权的平均，认为民权的扩大是争而被认可的结果，但最终还是认为君主立宪在现实中是必要的：

当今之世，治人者与统治者之权力，固处两强相对之势，然就其大体观之，则治人者犹处于强，而统治者，犹处于弱，盖不然则国家不可以一日存，诚有不得不然者，且不第今日而已，恐他日亦正不免。盖国家之主权，必在治人者之手。苟治人者无此大权，则国家必亡，一定之理也。

（第56页）

★第五、六章引述的人名有，斯宾率尔、海尔威尔、失弗勒、里勃尔、伯伦知理、薄师德、拔奇霍、马克来、太洛尔、孟德斯鸠。

第七章《贵族与平民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第57-69页）从印度、埃及的等级制和日本、支那的士农工商，讲到欧洲的贵族与平民的权利分配：

“惟贵族与平民之间，互相冲突，即两者之权力，互相平均，当是时也。为平民者，脱从前之压抑，而握有相当之权利，为贵族者，去其特权，或限其特权而变为相当之权利。是即平民占有强者之权利以制胜贵族，遂不得已而认为法律制度上所实有之权。此与被作（制）者之制胜治人者，其理毫无所异。是可知权利者，皆出于不得已而为人所认许。”（第65页）

但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有利于进步，而且也是必然的。（第68-69页）

★第七章引述的人名有，脱师登、葛姆泼老、海尔威尔。

第八章《自由民与不自由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第69-84页）主要讨

论了人类社会的奴隶问题，特别是近代社会的黑奴问题，除论旨不变外，最精彩的地方是以黑奴现实来攻击不能自圆其说的天赋人权和基督教的平等博爱：

“亚美利加洲又有新奴隶出焉。新奴隶者何？即非洲之黑人是也。此奴隶与古代之奴隶异，盖由人种各别，故美洲白人，直视为禽兽，其相待之酷，与古代同种之奴隶，诚不可同日而语。然此与白人所奉基督教之宗旨，实大相刺谬。其所以然者，盖利己之心人所同有，苟非利己，安肯利人？此实一定之天则，虽基督教，亦有无可如何者矣。”（第73-74页）

但加藤认为，美国解放奴隶毫无意义，理由有二：（一）黑奴的权利不是争取来的，因此有名无实；（二）解放了旧的奴隶，又有新的奴隶产生，如支那、印度的“苦力”和日本的“工人”。（第82-83页）

★第八章引述的人名有，德伦都司、威辟脱、雪耳师、太奇笃斯、环益兹、海尔威尔、葛姆泼老、配鲁太、白格尔、亚立斯度德、伯伦知理。

第九章《男女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第84-98页）主要从男女天然不平等来谈欧洲的女权运动。其中在谈到支那、日本的“一夫而数妻”之例时，译者注释道：“按西语波力该密，日人译曰一夫娶数妻之制，又西语摩诺该密，日人译曰一夫一妻之制。其实波力该密，为一男娶数女之意。我国风俗有妻有妾，西人亦目为波力该密。然既译为一夫数妻之制，则我国除妻之外，皆称曰妾，而目为一夫数妻，吾国人恐有所不服。又摩诺该密，实为一男一女之谓，今既译为一夫一妻，吾国又必误会，以为吾国之法，即系摩诺该密。故日人所译，用之汉文，殊有不妥，然另译适当之字，一时不能骤得，勉强改窜，转不若日译之顺口，故不得已乃之，以待博雅者之改正焉。”（第87页）这对研究日译词汇是怎样进入中国是有参考价值的。

加藤最终认为，实现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的娼妓和比土耳其更多的蓄妻纳妾是最有力的证明。

★第九章引述的人名有，拔霍亨、配失尔、海尔威尔、薄师德、海尔威尔、斯宾率尔、富雷益、鲍意默尔、菲尔梅尔、弥勒约翰、李夫内尔、皮孝夫、奥登根、亚尔伦、拉登蒿孙、拉蒲勒、弥尔约翰；伯伦知理、法兰兹、惠庆根。

第十章《国与国之强权竞争及其权利之进步》（第99-118页）主要是讨论《万国公法》和现实中的“国权”问题。加藤坚定不移地认为，《万国公法》并不是基督教平等博爱和人类世界道德进步的产物，而是“由强权之竞争而出，盖亦两强相峙，不得已而互认为权利”，即少数欧洲国家“权力之平均”的产物。（第101-102页）其强有力的论辩在于对欧洲文明国家双重标准的批判。

如既然损人利己是“凡世界万物谋生之宗旨”，那么“高谈道德者，每以利益为非，不亦谬乎？”欧洲把弱国屏于万国公法之外。“而压制之，践踏之，不遗余力。然此实大背于基督教博爱之旨，与天赋人权之旨，并各国平等之旨。但所谓当然之天则，亦无可如何者，是可叹也。”（第104页）

又如欧洲之间虽然通行旨在各国平等的《万国公法》，但“遇野蛮之国，或半开之国，则夺其土地，逐其人民，以为殖民地，苟可以压制之者，不遗余力焉。此实欧人之宗旨。盖其宗旨，首在利己，而所谓野蛮国半开国，则其生命财产之权利，在所不足顾，其独立不羁之权力，在所不足道。其意盖谓，苟有利于我欧洲之文明人，是亦足矣。”（第106页）对中国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发生在将眼前的生存问题了。

但加藤又认为，即使《万国公法》是少数强国的“公法”，也仍然是一个可以通行全球的“公法”，因为“文明强大之国，一旦联为一国，已足以统治万国而握其权力，则即谓之宇内一统国，固无可不可”。（第116页）这里，加藤以《万国公法》为依据，提出了“宇内一统国”的构想。这是在全书的时刻不离现实，即时刻不离“吾人社会发达之事迹”的内容当中的唯一的可以叫做“想像”或“展望”的成分。那么，“展望”到了什么呢？加藤写道：

故所谓宇内一统国，非由世界万国各以平等之权利自由互相协议而成，不过欧美各国及他洲二一文明之国，以厉害相同而起。（115）

笔者以为，在这个“展望”中不是可以找到加藤为近代日本所选择的位置吗？

★第十章引述的人名有，伯伦知理、葛洛久斯、葛姆泼老、海尔威尔、黻路亨利（黻勒勃尔？）、加师朴尔、堪德、翁德、斯宾率尔、穆尔。

## 八、加藤弘之在中国

以上用两个部分对《物竞论》的内容做了简单的归纳。如果说《天演论》还是用自然界的“物竞”和“天择”来对现实世界进行一种“文学性”的暗示的话，那么，《物竞论》就以“天则”或“公法”的形式赤裸裸地告诉人们，人类社会本身正是这样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强者权利=权力”的世界。这或许是最能注释当时中国现实的说法。其次，他反复强调的权利是靠实力争来的（即不得被“认许”的），不是被赐予的看法，和《天演论》的“与天争胜”的观念亦大为相合。第三，他以现实为依据，对天赋人权和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所做的有力批驳和揭露，也可以使当时的受厄无告的中国读者引以为同调的。但加藤弘之选择的并颂强者的立场，以及不折不扣的“损人利己”的道德主张，会使中国读者做何感想呢？至少在鲁迅那里又是怎样呢？这

是将在另一篇文章里探讨的问题。

也许是《物竞论》的影响，加藤弘之的主要著作，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如《人种（权？）新说》（陈尚素译，东京，译书汇编社）、《天则百话》（吴建常译，上海，广智书局）、《加藤弘之讲演集》（上海，作新社1902年）、《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王壁如译，上海，北新书局）、《政教进化论》（杨廷栋译，上海，出洋学生编辑所）<sup>（20）</sup>。而要说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要提到梁启超。检索到九十年代中期为止的与梁启超有关的文献可知，<sup>（21）</sup>梁启超不仅读了《物竞论》，而且还读了其他著作，甚至有十几篇文章都大引加藤弘之，甚至还有专文介绍，所以研究梁启超的学者们，都把加藤弘之看成对梁启超的国家思想的形成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不过，这已经是本论以外的问题了。

注释：

- （1） 参见加藤弘之著，田畑忍解題《强者ノ權利ノ競争》第53页，日本評論社昭和十七年九月十日。
- （2） 参见《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9-50页。
- （3） 参见拙稿《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与鲁迅》（上），《関西外国語大学研究論集》第67号（1998年2月）。
- （4） 参见《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第148-15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
- （5） 关于版本，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4页载，《物竞论》由上海作新译书局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出版单行本，“120页，22公分，0.50圆”。邹振环则更进一步调查确认《物竞论》有三个单行本：“1901年8月就由译书汇编社出版单行本，销路颇好，1902年7月由上海作新书局再版，1903年1月又由作新社图书局出版第三版。”
- （6） くろしお出版，1981年10月增补版第二版，第243-328页。
- （7） 参见王遽常《严几道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严复研究资料》，海峡出版社1990年1月。其第30-31页记：“（1896年）初夏，译英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以课学子。”另外，王栻在《严复与严译名著》中认为，《天演论》的“初稿至迟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开译，可能还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严复研究资料》第176页。
- （8） 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 日本留学史》第五章-33-《留日学生の翻訳団体》里的“译书汇编社社员姓氏”，该书第259-260页。《物竞论》译者也在其中：“杨荫杭 字补塘东京专门学校学生”。

- (9) 同注(1)。分別参见第131、156、168页。
- (10) 《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6页、第3页。
- (11) 据书后广告，另外五种是：  
福澤諭吉著 富田正文解題『學問の勤め』、竹越與三郎著 木村莊五解題  
『南國心』、佐田介石著 木庄榮治郎解題『社會經濟論』、山縣有朋著 松  
下芳男解題『陸軍省沿革史』。
- (12) 参见田畑忍解題版第323页。
- (13) DATA Discman Sony DD-2001版。
- (14) 田畑忍解題版第58页。
- (15) 田畑忍解題版第234页。
- (16) 《天演论·译例言》，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第9页。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 (17)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第150页。
- (18) 田畑忍解題版第128页。
- (19) 译自解題版第127—128页。
- (20) 参见《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其第124页的《人种新说》书名里的“种”  
字，疑为“权”字之误。待考。
- (21) 北京大学出版社《著名学者光盘检索系统·梁启超专集》，1998年。

附记：在查找《物竞论》原始资料之际，承蒙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侯明女士的  
大力帮助，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